

名 编辑随笔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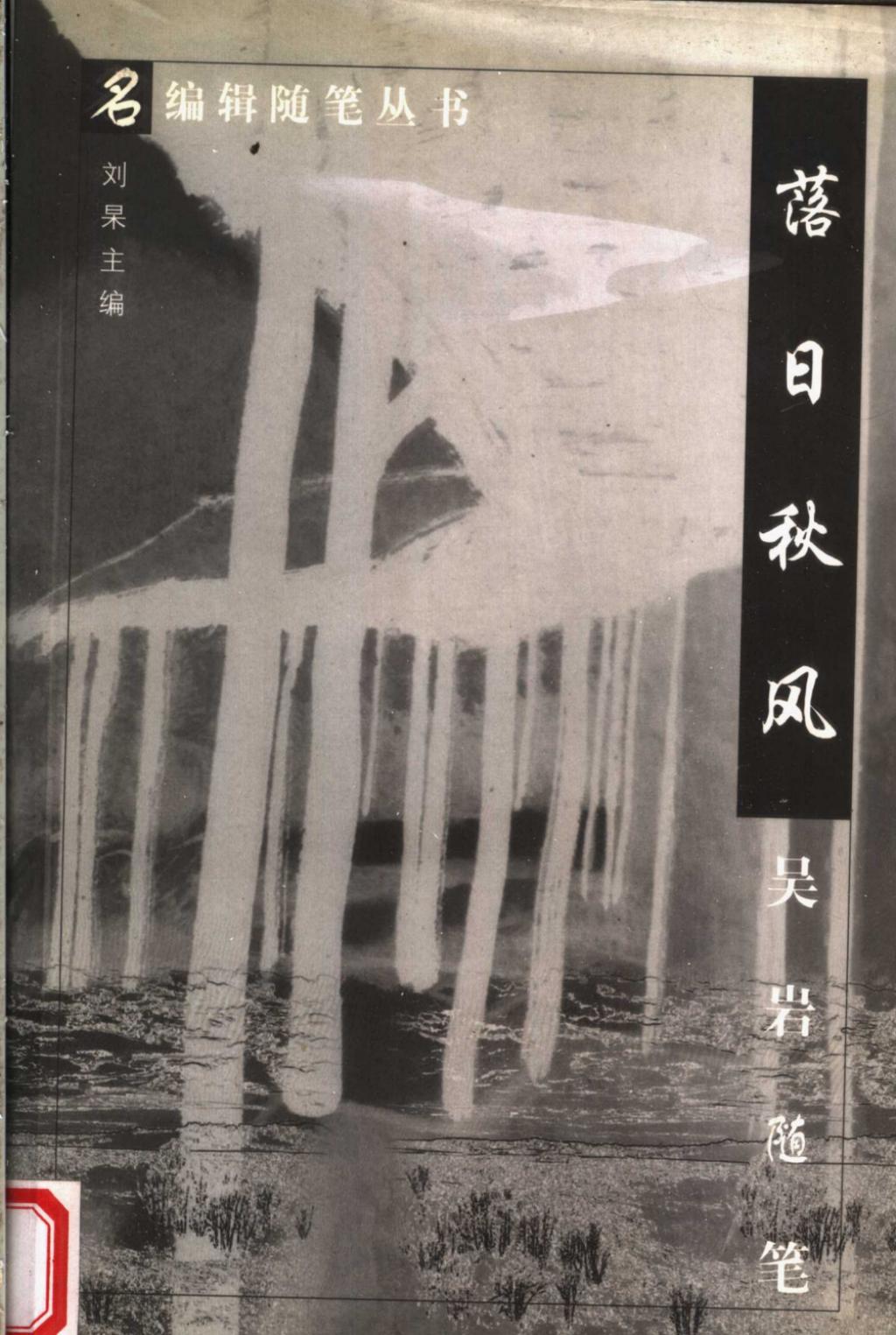
刘果主编

落日秋风

吴岩

随

笔



落日



吴岩随笔

秋



名

编
辑
随
笔

刘果 主编

从
书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落日秋风/吴岩著 . - 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8

ISBN 7-5080-1633-5

I . 落… II . 吴… III . 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 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3568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 经销

北京房山先锋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开本 11.5 印张 265 千字

1998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100 册

定价: 18.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怀念与追忆

怀念方光焘先生	(3)
追悼郑西谛先生	(15)
我的老上司冶秋同志	(24)
春风化雨忆老林	(29)
朝花夕拾	(34)
回首当年	(43)
练笔、感受、共振、再现	(60)

撷芳咀华

1949 年开明版《哥萨克》小引	(71)
1979 年江西人民版《克雷洛夫寓言》译后记	(76)
1981 年上海译文版《旋涡》译者后记	(84)
1981 年上海译文版《农民》译本序	(93)
1985 年上海译文版《小城畸人》译者后记	(112)
1995 年天津百花版《纪伯伦散文诗选》译者后记	(122)
1997 年上海译文版《心笛神韵》译者前言	(135)
点点流光	(141)

望霞听雨札记	(147)
从译制片配音演员说到文学翻译	(171)
给《嫦娥》添个注解	(174)

山水情趣

我是借眼睛游北海的	(179)
走马西安	(184)
武林秋	(197)
踏上黄山人已老	(211)
追赶春天	(228)
黄桷和石榴	(231)
三峡惊梦	(233)
黑非洲散记	(237)

晨窗随笔

时间赋	(269)
诗与画	(272)
想象的翅膀	(275)
蒙太奇	(277)
故事新编	(279)
饕餮者言	(281)
大与小	(283)
为书痴的一生	(285)
莫道诗人多寂寞	(288)
清园与竹	(290)

别是一般滋味 (292)

寓言拾穗

寓言九则 (297)

“灾区”奇闻录 (307)

黄昏漫记

北京味怀旧 (319)

吴苑深处 (326)

益智图 (332)

随便种点绿 (335)

买菜散记 (339)

乡愁未消双鬓雪 (3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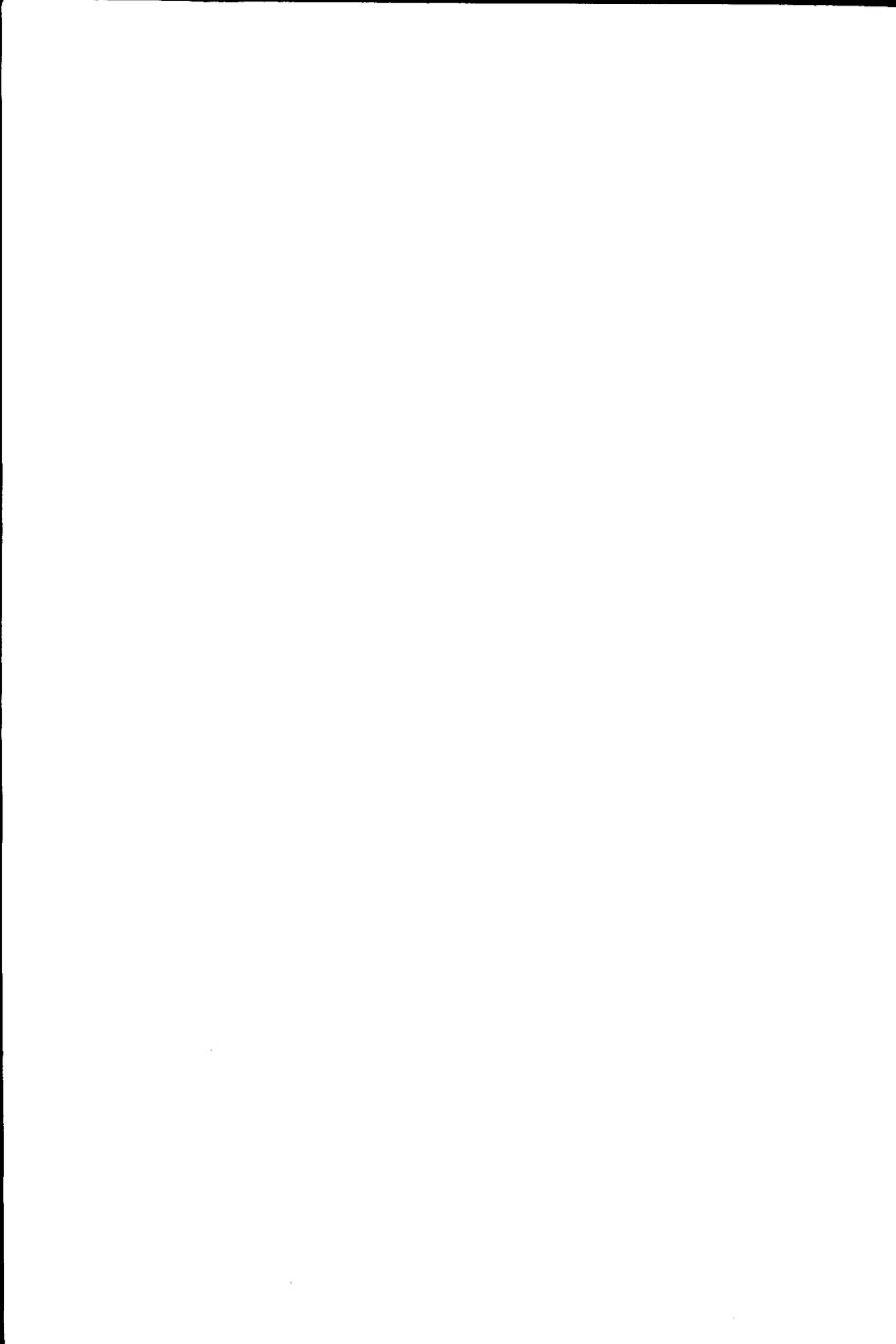
虞山春雨老少年 (350)

太湖月 (356)

早春气息 (359)

跋 (362)

怀念与追忆



怀念方光焘先生^①

雨，连连绵绵的下着。室内弥漫了一种叫人无可奈何的湿

① 此文作于太平洋战争期间。发表后，光焘师曾看到过，说是“很像”；我却在寄出文章后，直至1997年才由陈梦熊、姜德明先生的帮助，方始读到了复印件。当年光焘师最苦恼的是：住房愈搬愈小，有关语言学、语法学的书大部分钉在木箱里，无法充分利用；当年的学生呢，也还没有发现真正的“传人”。抗战胜利，他随暨大从福建迁回上海，住在竹骨烂泥的房子里，后来他支持进步学生，与校长闹翻，被解聘，可那时他已经培养了语言学与语法学的接班人了。解放后他在南京大学教书时，是他生活最安定的时期，也是他学术上最钻研最丰收的时期。1964年，他因病逝世。尽管他生前没有编过集子，他的学生却把他的论文、报告、提纲、教材讲稿的纪录编成了《方光焘语言学论文集》、《语法论稿》和《方光焘语言学论文集》。人谢世了三十年，却有作学生的一而再、再而三地收集、整理他的文稿、讲稿，“奉献给当代和后世”，方光焘先生也可以含笑于地下了。

商务版的论文集是方光焘先生语言学、语法学著作集大成的果实。方华寄我的书上盖有图章曰：“方光焘教授诞辰百年纪念”，胡裕树教授在“编后记”中概括说：一、“建基于现代语言学理论——索绪尔语言学说之上而有所发展、有所前进的语言观”，二、“在语法方面，主张从形态出发，从‘广义形态’为汉语语法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三、“经过长期探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与语言观一致的方法论、方法原则”，四、“充分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求实的学风”，也体现了“他吸收和支持新的方法、新的成果的热情”。我在学校里没有读过语言学，所以摘引胡裕树教授的概括。看来光焘师的语言学与语法学方面的成就，日益为人们所认识，堪称“传人”的也不止胡裕树教授一个。这是光焘师的幸福。

气。天黑得很早，不知是什么时候入了黄昏的。在昏黑的烛光下，我打开了朋友从南方来的信，内中有一段说道：“方先生和我住在一起，经济上相当窘迫，对于周围的那种敷衍苟且的情形，他又看不惯。……”虽只寥寥的几句，反复地读着时，却仿佛见到了先生的风貌，心里说不出的怀念和惆怅。

雨渐渐的大了，正敲着窗子，烛光也摇曳不定。看表，还不过八点钟：若是大家都在上海，此刻乘了电车再换坐公共汽车，到方先生家去闲谈还不算晚呢！——心中那未想着时，突然的感到万分寂寞，仿佛两年来的孤寂，几乎全变成了可以触摸的东西，累累的堆叠在四周；仿佛雨声也太乱太杂了。

对着烛火荧荧，无以为计，倒想琐琐碎碎的记点方光焘先生的事，怀着取暖的心情，就我所认识和理解的，画出这位老师的面影来。

我没看见过方先生的照片，在真如念书的时候，我并不认识方先生；虽然他天天在我们的宿舍门前走过。我只知道凡是选读他的“日文”的同学，在上讲堂之前，大多要温理一下书本，心里便想：大概总是一位十分严峻的教授吧。及至我因选读他的“翻译”和“文艺习作”而认识他时，学校已经搬进当时的租界，方先生和他的家眷也在马斯南路住下了。

三八年秋天，我突然病倒，生起伤寒症来了。所谓“突然”，指的是我当时的感觉。朋友和同学们有感觉“突然”的，都纷纷的来望我。来了以后，他们自己找座位，自己倒茶喝，同我随便谈几句，或是几个同来的人，互相说笑聊天，忽然想到要走时，便一齐哄的走掉了。因为都是极熟的朋友，我家里的人，又都在忙乱之中，所以一概不予招待，任其自来自去。一天上午，朋友徐微又来看我，同来的还有一个人。那人走到三层楼，在我的床边

坐下时，微微有点喘息。他示意叫我不要客气，切弗动弹，接着便问我请什么医生，吃些什么东西，怎样吃法。话是很平淡的话，态度则十分认真。听到我的答话后，他点点头。点点头后，他却找不到话说了；我也十分惶惑，不晓得说什么话好。如是的沉默了三分钟，他看看表，站起来道：“我十点钟有课，——须得快点走了。”便匆匆地走下楼去。徐微为我送他出门。重新回到楼上时，我就怪徐微不该把方先生也当做“侠子”，拉了来看我的病。

“我又不曾拉他，——他听说你生的是伤寒，就急急乎要来看你。”

“我真不晓得说什么话好。奇怪的是方先生也不说什么。”

“他怕你吃生硬的东西。——你已经告诉他只吃流质，隔三个钟头吃一次，他自然不用说什么话了。”

当我们这样讲着时，我母亲和我的一个表亲，恰巧也来到房中。母亲听了，觉得失礼之至，非常的过意不去。徐微却顺口道：“因为是方先生，这点倒不必介意：还是这样的好。……”我那表亲当时没发表意见，等徐微一走，便问我道：

“我觉得真奇怪，刚才我在门口遇见的那个人，穿一件灰不灰黄不黄的袍子，头发硬得像茅柴，眼镜深得像两个洋瓶底，又瘦又黄，就是你的先生，就是国立大学的教授吗？——还不及私立小学的校长和洋行里的买办神气哩。”

是的，那就是方光焘先生。

在学校里，我们那一系的人最少，师生之间的关系，也较他系来得密切，作学生的到教授家里去借书甚至聊天，也是常有的事。但就一般而言，接谈之际，无论在师的一方面或是生的一方面，总意识到彼此之间的那点距离，因此在举止上或是言谈上，

用一句当时流行于我们间的话，都是多少有些 Reserved 的。说也笑话，当老师们谦和地递过来一支烟或是一件点心，用手去接时，仿佛那是分给自己的一张考卷或是一份讲义似的。到方先生家里去是难得有点心吃的，偶而方师母去买了馒头来，方先生大概总要数一数，顺口道：“恰好每人两个。”于是大家伸手去取，一刹那便完了。烟是常备的，敬的时候却很少，总是将整包丢在桌上，尽各人随便拿来吸。但主要的特点，还是方先生说话的直率和坦白。他除非不开口，一开口，就像河水开了闸，什么都留不住了，好在他也不想留住什么。但也就因为这缘故，有的人以为他率真，可以亲近，有的人以为他不留情面，远远的规避着了。

那时候，在我们几个常在一起玩的朋友中，华铃是“把诗当做糇粮”的。对于他写的诗，李健吾老师和那时在编一张夜报副刊的王统照先生，都极为推赏。后来编成集子，李先生还给他作序，括号里的话，便是引自那绚烂的序里的。集子印好后，分送很多，华铃虔诚地征求批评和意见。决定一件艺术品的价值是很困难的，我们自然可以不必置喙；可是读后的印象，却不能说没有。但，就各人读后的喜恶而论，大家却很不一致。凡欢喜他的诗的，答起诗人执拗的问题来，自然比较容易；而不甚欢喜的，既怕伤了他的自尊心，又怕自己不说实话，就觉得很难措辞了。徐微顶乖，答得也最俏皮：“我最欢喜你那些附注！”有时候华铃欢喜在诗后面加点注，往往很长。同样是心血的结晶，（写得真的不坏），附录也为作者所溺爱，有人欢喜，他是高兴的。于是高兴地再去问别人的读后感。这就轮到了方先生；他答道：“我看不大懂。”就是这么直截的一句答话；但在方先生，已经算是很含混的了。华铃也并没因此不高兴：他虚心，明白当面说实话原是方先生的本色。——不仅如此，即使涉及了他自己的事，方先生也一样的直率坦白，毫不隐讳。一个饱经尘世的中年人，自然懂得

什么叫做掩饰，他却不愿意那么做。例如在上第一堂的“文艺习作”时，方先生就很不圆通的告白道：

“这一个 Course 是院长指定我来教的。一个专任教授必须教四个 Courses，我教了这一个，便凑足四个了。据说以前张天翼先生教过这样的功课，可惜他已经不在这里了；我自己却不知道应该怎样教法。创作恐怕不是教室里所能教得好的吧。然而院长已经点了菜，我这个坏厨子总得勉力烧一下，若是诸位吃得不好，我以为还是早点退选来得妥善。这功课虽名为“文艺习作”，我却想把它缩小为小说和散文的习作。诗，我是不懂的。其实小说我也弄不来：我以前的确也曾学写过小说，然而失败了的。后来又想研究文艺批评，终于完全把兴趣和精神集中到语言学的研究上了。你们要听我的课，还是听语言学吧：教授过的回数多，自己也还在不断的用功，讲起来总比较的有把握些。至于这凑数的功课：“小说法程”或“小说作法”我是一向讨厌的，不想讲它；此后只有逼你们多写，同你们讨论文学上的种种问题，（最好是由你们提出来），再把我学做小说的失败告诉你们，作为前车之鉴。……”

听方先生的课是很吃力的，毫无轻松愉快之感。他不说笑话，没有海外奇谈的穿插，他的讲演大多是朴素而枯燥的，说得又较一般人滞缓，倾听着则嫌它不够流畅，用笔去记时，却觉得很少有多余浪费的字句，仿佛又讲得太快，没法子记全它了。偶而因意外的事故，触动心经时，方先生也发点牢骚。牢骚除了引起人的共鸣或反感外，同时也引起听者和说者的痛快之感，但方先生的牢骚却令人窒息。其实单是他那说话的声音，已经够人窒息的了：一字一句都是从喉咙头逼压出来的，不像“说”也不像“讲”，简直是在“喊叫”。每逢上课时，他总是那末声嘶力竭的喊

上五十分钟，虽然教室很小，学生也并不多。而他自己正有着肺病的嫌疑，朋友们都劝他戒绝烟酒，住到干燥的北方去，他自然明白叫喊不宜于他这样的身体，却怕学生们听不清楚，始终认真的喊着。

认真是方先生为人治学的基本态度。在有意无意之中，他让自己的那点态度，在听他的课的学生中间，起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

在“翻译”课上，除了叫我们频频练习翻译外，并指定一二本名家们译注的中英对照的杰作，嘱我们回去细细推考，将认为有问题的译文摘出，在课堂上提出讨论。我们阅读时大多马虎，语文程度又差，起初很少有人能指出误译的处所。方先生可读得十分认真，他体味原作，用日法两国译文对照比较，指出中文不少误译的地方，同时又提示了比较完美的译法。渐渐的，我们也学得了较为精密的审别力，发觉所谓名家也者的译文，平均每面上有二三处误译或是曲解，有一位更其滑稽，译文虽错，附录的注释却是对的，原来他的注释抄自日译本，而译文则是他自己的手笔，没受外来的“影响”。提起这些名家并无十分鄙薄的意思，他们也许自有苦衷，特别是生活上的苦衷。倒想谢谢他们的疏忽，使我们学到了认真和谨严的翻译态度。方先生自然更应该感谢，可是他不喜欢那一套。也好，姑且按下感谢，续记一件他认为遗憾的小事：有一次，一位同学，用他自己的署名，不加说明地把方先生的一段讲演的纪录，拿出去发表了。那时他正在教修辞学，正尝试着用格式心理学代替联想心理学来解释修辞上的比喻等等的课题，发表的大概正是这方面的一段。方先生知道了这事，看到了那段发表的东西后，心中十分不安，快快的道：“这门功课，连这一回在内，我总共不过讲过两次，一切材料和心得，都在发展之中，离成熟还远得很。我在课堂上讲，也还是取

讨论的态度，他却贸贸然的拿出去发表了！而且他记得又很坏，脱漏错误的地方很多，叫读者怎会看得明白呢？……”

方光焘先生的认真，用之于治学，会获得怎样的成果，是不消说得的。但以他的直率和认真，用之于人事的葛藤，那结果又是怎样呢？鲁迅先生在“忆韦素园君”一文中说：“一认真，便容易趋于激烈，发扬则送掉自己的命，沉静着，又啮碎了自己的心。”方先生已是中年人了，激烈得送掉命是不至于的；但因为太认真而面红耳赤，与人当面失欢的事，却不是没有。这结果，便是逐渐走上孤独的路。孤独使人寂寞，也使人沉静；“沉静着，又啮碎了自己的心。”这就是他的朋友所谓“老方又在发牢骚了”的根源之一，也就是为什么他的牢骚常令人起窒息之感的缘故。但，若说老方的牢骚完全在于他的认真过分，也不对；那是另有其它的原因的。

住在马斯南路的时候，方先生独占一间假三层楼，孩子们白天在楼下公用的客堂里玩耍，到了夜间才上楼睡觉，他因此倒可以静静地读些书编些讲义，疲倦时还好从窗口探出头去，望望马斯南路上的梧桐树，树下的行人。后来学校从法租界迁至康脑脱路，方先生也搬到了新闸路去住，说是离学校近得多，可以省掉一笔车资，虽然他总是乘三等的。可是那房子却较从前小了，是两间一丈余见方的房间，一间作寝室，一间便算是方先生的书室兼会客室了。那书室很暗，从惟一的一扇窗子望出去，但见一簇簇黑压压的屋脊。方先生说：“房金倒不算顶贵。”就那末住了。然而住得不久，又悄悄地搬到了曹家渡：这回是他的一个朋友，把楼面的一半，让给他住的。“他只肯收我三十块钱一个月。”方先生说，“你们都没有来过吧，十路公共汽车的末一站，车子把你们送到我家门口，就不再往前开了。”算是说笑话，声调却

十分寂寞。既在末一站，路自然是很远的，方先生每天乘了公共汽车到校上课，但回去时，却不让车子送他到门口，他“安步当车”，用他自己的话是：“走惯了倒也不觉得吃力。”

那时候，曹家渡是被目为恐怖之区的。每逢星期日，若有学生单独到他家里去时，方先生总是抱歉似的道：“你一个人来的？——不觉得有点惴惴然吗？”或者是类似这样的话。他搬到那儿后，我第一次去看他时，听到的话是这样的：“弄堂很龌龊，‘谈话室’和‘俱乐部’都观赏过了吧？”虽然想聊以解嘲，却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无可奈何的神色。接着便告给我：只有他一个人在看家，方师母领孩子们去看电影了。他说：“搬到这里后，因为路远，小的一个孩子就没进学校，十岁的那个仍在胶州路的小学里念书，每天来回都是走的，几个月来没坐过公共汽车，可是因为省了车钱，吵着闹着，说是这学期一定要看一次电影了。……”

……是我离开学校后的事了。一个星期日的早晨，我独个子匆匆的上曹家渡去。方先生刚起身。他把一包原封的“发达尔”拆开，丢在桌上。我就自己取来吸。吸着纸烟看方先生洗脸吃粥。及至他吃罢粥，在那张陈旧的写字台旁坐下时，我有点诧异了：他不抽纸烟，却从抽屉中拿出一支蹩脚的吃了一半的雪茄烟，点上了火。我想问，他先开口道：“我现在改抽这个了，一天至多抽七支，香烟却至少要二三包一天。划算起来，还是抽这个来得便宜，而且过瘾！……”于是吃力地吸着那不易燃点的雪茄，关心地问起徐微和张可，易默和祝敬，也问起远去西南的华铃。……教授们问起毕业生的近况，也是常有的事，但他的问法，却令人感到他的孤寂来。一个寂寞的人的话是最长最多的，方先生一直说到了午饭时分，意兴反而更加酣畅了。他说：

“我半抢半夺的，叫戚先生让了一甏酒给我，确确实实是绍

兴人从乡下带出来的。酒是好酒，价钱又便宜，只四十七块钱。戚先生自己也只有一甏了。”我不会吃酒，却很贪杯，方先生是知道的，所以他接着说：“你就在这里便饭吧。”

那天的饭菜是：一只肉炒酱，二只蔬菜，另外还有一盆炒蛋，显然是方师母为留“客”而特地弄起来的。吃酒之际，方先生又叫方师母去买了一块钱的“扁尖”和半块钱的花生米。撕吃着“扁尖”时，方先生自言自语的道：“唔，这个我是中吃的。”这使我想起第一次在马斯南路他的寓所吃夜饭时的情形来，那次在座的还有易默，华铃和徐微，方先生特地叫了两个菜，我们嫌他客气，他指着凤爪冬菇汤道：“唔，这个我是中吃的。”而现在，从同桌的他的孩子们的眼热的程度上，可见即使是“扁尖”和花生，也不是常常买来吃的了。

方先生的酒量并不好。一喝酒，不论是半斤或是两三两，他就醺醺然了。但并不呕吐，只是醺醺然，只是话多罢了。那天酒后的话，多而且杂，像是从什么不知道的地方突然涌出来似的。

“我出去读书时借人家的钱，至今也没有还掉！”他说。——虽然有些醉意，仍不欢喜用出国和留学等字样。“回来以后，无论是做着教员或是教授的时候，总没有能积起还债的钱来。生活刚刚比较安定，勉强可以省下一点钱时，往往发生了意外的事，不是有人生病，便是女人生产，再不然就是发生了战事了。起初倒还存着还债的心，一再的延搁下来以后，到现在却连还债的奢望也不敢有了！——那样的事，不是笑话吗？讲出去是不会有相信的。可是照目前的趋势，恐怕不加借新债是不能生活的了。……”

接着就慨叹生活指数的高涨，焦虑地说道：

“你大概也有点知道的：我是个只会紧缩日常开支的人。然而缩到了曹家渡，紧到了这样的地步，还是难以维持生活，你说